



现代汉语 教学参考书

唐朝阔 王群生 主编

09.4
4

高等教育出版社

226
H109.4
T24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现 代 汉 语

教学参考书

全国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科教材编委会 组编

主编 唐朝阔 王群生

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系列教材《现代汉语》的配套参考书。全书与主教材一致,分“绪论”章和“语音”“文字”“语汇”“语法”“语用”五章。章内设“教学提示”“思考与研讨参考答案”“参考文献”“参考资料”几大板块。“参考文献”均为该领域内的扛鼎之作,极具代表性。“参考资料”也精选该领域内必备的、不可或缺的资料。本书旨在帮助教师用好主教材,对有志于语言研究的学生也有开拓视野、积淀知识之功效。

本书适于师范院校师生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教学参考书/唐朝阔,王群生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系列教材
ISBN 7-04-008816-9

I. 现… II. ①唐…②王… III. 汉语—现代—师范
学校: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H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6186 号

现代汉语教学参考书
唐朝阔 王群生 主编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 55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54588

传 真 010-6401404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二厂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8.75

印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0 000

定 价 8.6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一、教学提示

“绪论”简要介绍了普通语言学 and 现代汉语两个方面的基本常识。通过教学，学生要掌握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符号体系、语言的主要功能和现代汉语的概念、特点、地位及现代汉语方言区域等内容，提高对学习现代汉语这门课程的认识，奠定学好现代汉语的基础。“绪论”部分的重点是语言的基本功能、语言的符号体系和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标准、特点及地位；“绪论”部分的难点是语言的产生、语言的无阶级性和现代汉语的形成及其方言区域的划分。师专没有开普通语言学这门课程，“绪论”列专节介绍一些基本常识，是非常必要的，学生除了学好教材所写内容外，还应根据教师的指导再读一两本普通语言学方面的书，以弥补讲授之不足。旁批是绪论内容的深化和扩展，与绪论互相构成整体，学生应高度重视，力求理解和掌握好。

二、“练习与研讨”参考答案

第一节 语 言

一、语言是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一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语言具有使用上的轻便性、负载语义信息的无限性和表意传情的精确性等特点，而其他交际手段不具有这些特点，或只是有很微小的一部分，如手势、眼神、旗语、图画、铃声、号角、烽火、红绿灯、电报代码等，它们只能是人类社会的辅助性交际工具，而且在使用范围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交际时必须以语言为基础。只有语言才能交流最复杂、最精密的思想，才能表达最丰富、最细致的思想感情，才能在无限广阔的社会领域里实施服务。因此说，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二、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因为它既不是经济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语言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类社会现象有本质的区别。语言之所以与经济基础不同，是因为它不能产生物质财富，不能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这种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语言与上层建筑也不同：它具有全民性，没有阶级性，而上层建筑的阶级性特别鲜明；语言的产生不与经济基础直接发生关系，而上层建筑则总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上层建筑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等。因此，我们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三、符号就是一种信号、记号。它只能简单地用来代表事物，而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

语言不是一份简单地排列各种符号的清单，而是一个由符号构成的既互相对立、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系统。按传统说法，语言这个大系统是由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而每个要素又自成一个子系统，如语音系统，语汇系统，语法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符号都可以跟别的符号组合，也可以被别的符号所替换，还可以把组合进行分解，但组合、替换和分解都必须遵循语言内部的结构规则，即语法。由此可见，语言符号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彼此相关联的，它是由语音、语汇和语法组成的符号系统，亦即是声音和意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是最高级、最复杂、使用起来最简便、容量最大、效果最好的符号系统，是其他任何符号不能比拟的。

四、现代科学把思维分为三大基本类型，一是技术思维，二是形象思维，三是抽象思维。三种思维中，抽象思维是最重要的思维，其他两种思维中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抽象思维成分。

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极为密切。首先，语言是思维赖以进行的最重要的工具。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是大脑进行判断、推理的活动过程，离开了语言，就很难进行判断和推理。其次，语言是固定思维成果的最重要的材料。思维活动的结果就是思想，要把思想固定下来，显现出来，必须借助于语言，语言便成了固定思维结果的工具。再次，语言是思维连续进行的最重要的手段。总之，语言作为思维的最重要工具，同思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要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必须提高思维能力；而要提高思维能力，重要的方式之一是通过语言运用的实践活动。

五、语言结构的共同性是语言结构分类的依据。结构分类不管语言的历时关系，只从共时角度根据语言本身的结构特点给语言分类。因为结构变化是形态学研究的范畴，所以又叫形态学分类法。

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是语言谱系分类的依据。语言的谱系分类，又叫亲属关系分类或发生学分类。这种分类认为语言之间是有“亲属关系”，有共同来源的。

第二节 现代汉语

一、现代汉语有两种含义：一是统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方言，这是广义用法；一是只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是狭义用法。

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发展，是在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先秦，我国汉民族就有一种统一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或“文言文”。古代汉语就是以“文言”或“文言文”为研究对象的。它的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是近代汉语演进和发展的源头。唐宋以后，有两种倾向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一是“白话”，一是“官话”。“白话”和“官话”的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基础。元明清三代都在北京建都，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官话便成为各级官府的交际语言，并流传各地，促进了现代汉语的发展。“五四”运动时期，掀起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这两种运动汇合为一，加速了现代汉语的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统一的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我们的党和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推进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提高了现代汉语的交际功能。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统一的规范的民族共同语，即现代汉语。

二、与印欧语系语言比，现代汉语在语音、语汇和语法方面有许多明显的特点。1. 语音

方面的特点：没有复辅音；元音占优势；有声调。这三个方面的特点，综合构成了它独有的声音悦耳，音调柔和，节奏明朗，韵律协调的音乐特色。2. 语汇方面的特点：双音节词占优势；构词方式灵活多样。3. 语法方面的特点：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词法句法结构方式基本一致；词类和句子没有对应关系；量词十分丰富，有大量的语气词。

三、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分支或地方变体。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我国汉语方言作了比较细致的划分，计有十大方言区：1. 北方方言；2. 晋语；3. 吴语；4. 徽语；5. 赣语；6. 湘语；7. 闽语；8. 粤语；9. 平话；10. 客家话。

四、语言是由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构成的完整体系。这三要素相对独立自成系统，各有自己的规律。以语音为例，一种语言的语音，它有多少音素，音素怎样组成音节，音节又怎样组成词，都有自己的规律。但是，这三者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语音是为体现语汇、语法而存在的，离开了语汇、语法，也就无所谓语音了，所以通常说，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汇一方面要凭借语音这一物质材料，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语法的支配，以此才能表达意义，使语言成为交际工具，所以说语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语法是从语言材料的运用实践中抽象概括出来的语言规律，离开了语音和语汇，也就没有语法。但是，语法又是组织语音、支配语汇的法则，所以说语法是语言的组织规律。可见，语音、语汇和语法三要素，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和谐相处，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体系。

五、现代汉语是世界上最成熟、最精密、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外国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地位。在国内，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各民族语言很自然地接受汉语影响，促进本民族语言的发展。如今，现代汉语已成为各民族相互交往的族际语。此外，汉语对周边国家，特别是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日语中现在还保留了1945个汉字。据统计，全世界使用汉语的人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汉语已成为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之一。目前，世界上出现了汉语热，学习和使用汉语的人越来越多，设置汉语专业的高校也不断增加，有关专家预言，21世纪，将是世界学习汉语热的世纪。

六、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和民族间的交往，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充分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必须大力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并不意味着要人为地消灭方言，而是要扩大普通话使用的范围，最终实现全民普及普通话的目标。

七、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这是由北方方言的影响和地位决定的：1. 北方方言分布广，使用人口多；2. 宋元以来一些著名的文学作品大都是用北方方言写的，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对汉族，而且对其他民族也有广泛的影响；3. 北方的代表城市——北京，几百年来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语言影响最大。综上所述，把北方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是北方方言取得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基础方言的资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是不能把“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改为“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

八、略

三、参考文献

二十世纪的中国普通语言学

石安石

我国的普通语言学,从20世纪20年代到现在可分为三个时期: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启蒙时期,50年代初至60年代为起步时期,70年代后期至今为进展时期。限于资料,本文所述只限我国大陆的情况。涉及的书刊到1996年底为止。

一、启蒙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开始有了普通语言学专著。先后有:(1)乐嗣炳《语言学大意》(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1923,以下“××出版社”均省去“出版社”),(2)王古鲁《言语学通论》(世界书局,1930),(3)沈步洲《言语学概论》(商务,1931),(4)张世禄《语言学原理》(商务,1931),(5)张世禄《语言学概论》(中华,1934),(6)张世禄、蓝文海译福尔《语言学通论》(商务,1937)。由于受日语的影响,有的著述以“言语”代“语言”,以“言语学”代“语言学”;那时还不讲“语言”和“言语”的分别。

早在10年代初,章炳麟弟子、留日归国的胡以鲁出了一部《国语学草创》(商务,1912)。此书“介绍了不少普通语言学的知识”(王力,1981;凡只注作者和年代的引文,见文末所列参考文献),为同时期各种语言学著作提及和引用。但它毕竟是一部讲汉语的理论著作,是一部“汉语概念”,而不是普通语言学专著。胡氏曾在北京大学讲授过语言学,写了一部《言语学讲义》,只在内部流传,未及出版,今天见不到了。

我国第一部普通语言学著作当推乐嗣炳(1901~1984)的《语言学大意》。它是乐氏在国语专修学校所写的讲义,由上海中华书局作为“中等学校适用”的“国语讲义第九种”于1923年出版。作者说:“现在坊间还没有出过一本专门讲语言学底汉文书。”“跟世界语言学家互相提携,这是语言学界最所希望、最欣幸的一件事了。”(《例言》)该书小32开本,字大行疏,不到50页,估计不过两万来字,但讲的问题不少。虽都只是蜻蜓点水,却能抓住要领。此书很受欢迎,到1929年就出了第三版。

王古鲁《言语学通论》是世界书局《文化科学丛书》之一种。《例言》称“本书纯以简明得当之日本安藤正次著《言语学概论》为根据”,有所增删;关于“国语国音”,多据胡以鲁《国语学草创》、黎锦熙《国语学讲义》和高元《国音学》。该书并不是一部简单的译著,它经过一番加工,使之适合一般中国读者;内容较乐著丰富,不过对语言内部组成只着重介绍语音原理,其他从略。

在普通语言学知识的启蒙上,较有影响的当推北沈南张的两部著作。

《言语学概论》作者沈步洲是留英归国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他接替了英年早逝(1916?)的胡以鲁的课程,后又任高等师范学校、国语传习所、女子师范学校等校多次讲授语言学。书是整理后的讲稿。多参考德国语言学家玛克斯·米勒(今多译马克斯·缪勒)和丹麦语言学家耶斯柏孙(今译叶斯柏森)。

差不多同时，商务又出了在暨南大学执教的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作者自称，本书编制取材，大部分根据美国布龙菲尔德早期的著作《语言研究导论》。

张世禄较有分量的语言学著作是他稍后应中华书局之约，把他在暨南大学讲授语言学课程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语言学概论》。此书作为《中华百科丛书》之一种出版。

沈张两部《概论》比较，后出的张著视野更宽，内容更为充实。作为一部教科书，尤具特色。此书不但通俗易懂，而且眉目清楚：章内分节，节内又立若干小标题；凡所引用，一概注明来源。每章末都附有供复习用的“问题”和“参考书”目录。书末有“中文名词索引”和“西文名词索引”。这样，极有利于语言学知识的普及。书中所用若干基本的语言学术语，如“元音”“音素”“国际音标”“语法的范畴”“形态学”以及语音的“同化”“异化”和语义的“缩小”“转移”等今天仍然通用。

这一时期，还有分科性专著出版。这限于语音学和语义学两个部门。

语音学方面，主持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出版过实验语音学名著《四声实验录》的刘复，译出了法国保尔巴西《比较语音学概要》（商务，1930）。赵元任在序言中称，就中国人学英语德法等外语来说，这“是实际上非常合用的书”，它也是“现代一部绝好的语音学概论”。国内学者自编的有张世禄《语音学纲要》（开明，1934）和岑麒祥《语音学概论》（中华，1939）。两书都讲到现代语音学的目的和方法，语音构成的原理，都以国际音标为工具对辅音和元音诸音素逐一进行了分析，还讲了音素的拼合及其在语流中的变化。后出几年的岑书在讲发音原理时，除讲了生理和物理两方面外，还强调了心理因素，并列专章介绍了当时人们还很不熟悉的记音符号——国际音标。此书还专辟“历史语音学”一编。岑书自称，主要参考了法国卢兑《普通语音学基本原理》和格拉蒙《语音学通论》两书。国内材料则主要依据钱玄同《文字学音篇》（《弁言》）。岑书20年后出增订本（科学，1959），改动较大，加了音位学知识的介绍。增订“特别着重于实用方面，不作过多的理论上的陈述”（《序》）。附录中有很有实用价值的汉俄英法德语音术语对照。

语义学方面有李安宅主要参考英国学者吕嘉慈和欧格顿（今译奥格登）合著的《意义之意义》而编写的《意义学》（商务，1934；渝一版，1945）。第七章译自吕氏访华期间的演讲辞。附录有二，其一为译自吕氏的《〈意义之意义〉的意义》。作者同时还出了一本《美学》（世界书局，1934），作为前书的姊妹篇。前书分析的是“理智的语言”，后书分析的是“情感的语言”（《巫术与语言·编者序》）。李安宅还根据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今译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编写了颇有影响的小册子《语言底魔力》（北平联友社，1931）。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刘复在北京大学开过语音学课，还为文科共同必修课讲过一讲“语言学方法论”。王力从法国归国后，1934年在清华大学为研究生开过语言学课程，还印发了讲义。1935年，罗常培在北大开了语言学课。随后在西南联大，罗、王二人又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过此类课程，罗的课叫“语言学概论”，王的课叫“语言学概要”；罗氏还在联大开过选修课“语言学名著选读”。曾留学英德、在厦门大学执教的周辨明，抗战时期在其弟子黄典诚的协作下，综合L. 帕默尔《现代语言学导论》第三部著作写成《语言学概论》一书，但直到1985年，才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方光蕙、岑麒祥和高名凯先后于30年代和40年代留法回国，在大学中也开设过语言学课程。

林祝敌编译了《语言学史》（世界书局，1943）。参考的是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

史》和叶斯柏森《语言，它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等四部西方学者的著作。实为西方语言学史。在“通史”编“古代”节中有一小节讲“中国”，简略地讲到我国古代的“小学”。

这一时期，在我国，从事普通语言学教学和学习普通语言学的人都非常少，但毕竟做了一些启蒙工作。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学者直接间接地从西方原著中获取了营养，运用到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之中。正如王力所说，“直到普通语言学传到中国，学者们的眼光才有了转变，能对现代语言进行静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用的是崭新的一套。”（王力，1981）

二、起步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语言学表现沉寂。1950年，除罗常培有《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而外，只出了几本介绍苏联马尔学说的小册子：缪灵珠著《苏联新语言学》（天下图书公司，附墨山宁诺夫《马尔与苏联语言学》），安德烈也夫《马尔的语言学说》（徐洙译，大众书店），谢尔久琴柯《马尔与唯物论之语言学》（秦佚译，大众书店）。这些书尚未及发生多大影响，就迎来了苏联的语言学大辩论。斯大林的总结性文章《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等（结集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1950）的发表，在中国语言学界引起震动。它既使人们认识到语言学的重要地位，更使人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指导作用。在我国语言学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语言理论受到空前的重视。

第一个效应就是“语言学引论”课程列为高等学校中外语言文学各系科的必修课。苏联在语言学大辩论后新编的部颁教材，契科巴瓦著《语言学概论》第一编（1953再版本）很快翻译过来（高等教育，上册周嘉桂译，1954；下册高名凯译，1955年；1956年合为一册重印）。其中第二章基本上是对斯大林著作基本观点的阐释。此书成了我国的通用教材。与此同时，高名凯将他在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引论”课的讲义整理出版：《普通语言学》（东方书店，上册1954；下册1955）。由于该书内容全面，而苏联教科书的第二编（语义和词汇，布拉霍夫斯基著）未及翻译出版，第三编（语法，维诺格拉多夫著）未成书，因此它在国内一个时期成为拥有广大读者的教科书。不久，出了增订本（新知识，1957）。增加“音位和音位学”“风格学”两章，还有若干补充、改正和删节。

随后出版的语言学教材，有以师范院校学生和一般读者为对象的朱星《语言学概论》（天津人民，1957），宋振华、王今铮《语言学概论》（吉林人民，1957），以外语院校学生为对象的上海外国语学院、哈尔滨外国语学院《语言学引论》（时代，1958）。马学良、罗季光、傅懋勳等的文集《语言调查常识》（中华，1956），是为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开课的讲稿。

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继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中华，1958）之后，写成了新的教材《语言学基础》（高等教育，1959）。方便教学是这部教材最突出的特点。大刀阔斧地删繁就简，集中笔墨讲解语言学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力求浅显明白。书中凡定义和结论性文字都下加着重号。每节之后有富有启发性的“思考题”。每章之后有便于复习全章内容的“小结”和“讨论题”。一些不需课堂讲授又是必备的知识，则编成“参考资料”，小字排出，作为附录，共12个。如“语言的本质”章附“思维 and 思想”“两种信号系统”和“先天聋哑人的思维问题”。全书分4编10章。在内容上，一是吸收了比较成熟的新成果；一是强调联系语言文字的应用，讲解语文政策中的理论问题。

1961年4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讨论统编语言学教材时，决定以《语言学基础》为基础，在原班人马基础上组成编写组，按新老结合的原则，以高名凯、石安石为主

编。初稿经试用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作了较大修改，于1963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共七章。基本框架仍旧，保留原书方便教学的教材特点，内容上有所充实和提高。

岑麒祥《普通语言学》（科学，1957）是1954年后在北京大学讲授提高普通语言学的讲义。“绪论”章包括了语言学简史。“对象”章介绍并批判了从自然主义到马尔各流派的语言观，最后着重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语言的基本原理。“方法”章讲了历史比较法和静态分析法。随后，岑麒祥又将他讲授语言学史的讲义整理成书，即《语言学史概要》（科学，1958）。书分引言、古代语言学史、历史比较语言学史、普通语言学史几个部分。此书既讲外国，也讲中国，如上古时期，既讲到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又讲了我国先秦和秦汉时代的语言文字研究。以下两部著作，诚如作者所言，多是“述而不作”（《普通语言学·序》），但在我国却是首创，是语言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语言学史概要》到80年代由作者修订再版（北京大学，1988）。修订本增加了古代印度部分和古代阿拉伯部分的分量，压缩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中关于印第安语的叙述，普通语言学史中关于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的部分各立专章重写。

50年代，高名凯写了两部专著：《语言与思维》（三联，1956）和《语法理论》（商务，1960）。后者是《中国语文丛书》之一。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语法问题的理论著作。此书的写法是，先摆出国内外各个有代表性的观点，逐一加以评论，然后讲解作者的结论。这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思索的天地。关于语法形式学和语法意义学的划分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词类”章写出了经过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后作者总结性的意见。书中还区别“造词学”和“构词学”。在句子类型上规定了“句类”“句型”“句模”等术语的不同含义。

普通语音学方面有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科学，1957）。它曾先期以《语音学常识》为题于1954~1955年间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署名田恭。书分七章，其中第六章为王辅世起草。成书时，作者对全书作过修订。重印本（商务，1981），由王均增写了附录《音位的“区别特征”和生成音系学》。

这一时期的压轴之作是高名凯《语言论》（科学，1963，商务，1965）。书分“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三大部分。从题目看，与当时一般著作一样，但考察全部内容，很有特色。此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

这一时期，我国语言学界开展过一系列关于一般理论问题的讨论。

规模最大的当属1958~1964年的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划分语言和言语，原是洪堡特首先提出而由索绪尔大力提倡的。斯米尔尼斯基发表《语言存在的客观性》（译文载《语言论文选译》第五辑，中华，1958），对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理论有所批评，并提出了他的见解，这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讨论由高名凯的《文风笔谈》（《中国语文》1958·5）和自我批判文章（《中国语文》1958·10）提出尽管语言没有阶级性但言语有阶级性的论点引发。先是方光蕙、施文涛《言语有阶级性吗？》（《南京大学论坛》，1959·4）提出异议，接着高名凯写出《论语言与言语》的长文（《中国语文》1960·1~2）全面阐述他的看法。此后讨论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何谓言语（同时涉及何谓语言），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和关系如何，言语有无阶级性。方方认为，言语是“言语作品的表达形式”，语言与言语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两者都没有阶级性。高方认为，言语是对语言的运用，“言语行为或言语活动和言语作品，统称为言语”，语言与言语不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语言没有阶级性，但言语却有阶级性。讨论

曾经暂时趋于沉寂。高名凯《语言与言语问题的争论》一文（《光明日报》1963.10.26）激发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南京大学学报》（1964·1）刊出《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专辑》，多角度地批评高名凯的10篇文章，方光蕙的《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作为专辑的总结。高随即再写长文《语言与言语问题争论的意见分歧的根源》进行反批评；此文直到1990年才得以问世（《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

与讨论言语有无阶级性的同时，语言学界还展开了语言学有无阶级性问题的讨论。

另一场较大规模的讨论是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问题的讨论。语言演变的原因本是语言学中的老课题，国外的且不说，20年代乐嗣炳书中就有一小节讲“语言变迁底原因”，30年代沈洲书中更有专章论述。这次讨论是我国学者学习运用矛盾论解决理论问题的一次交流。

再是语言融合问题的讨论。先是戚雨村著文（《中国语文》1959·2）批评高名凯在《普通语言学》和《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1958）两书中把“词的借用”也看成“语言的融合”的表现，是扩大了“语言融合现象的范围”。高名凯进行了答辩（《中国语文》1959·5）。随后，赵振铎进行了再批评（《中国语文》1959·8）。

词义性质问题的讨论，由岑麒祥《论词义的性质及其与概念的关系》一文（《中国语文》1961·5）引发。先是石安石和薄鸣两文（《中国语文》1961·8）分别对岑文某些论点提出异议。接着讨论在较大范围内展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词义与事物的关系、词义与概念的关系、同义词是否可理解为同概念的等。参加者有朱林清、夏延章、李峻峰、王维贤、王理嘉、侯学超等。

此外，还有社会习惯语的范围的讨论、基本词汇划分标准的讨论、词的分割问题的讨论、语言单位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

汉语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也涉及普通语言学的问题。如汉语实词划分问题的讨论，涉及词类的性质、对“形态”的认识、词类划分的标准。汉语主语宾语问题的讨论，涉及句法成分的确定是用意义标准还是形式标准；汉语单句复句的划分问题，涉及句法分析方法；还有普通话的规范问题，涉及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等，都有一般理论意义。

这一时期，译介国外语言学的工作加强了。主要是介绍苏联的论著。西方语言学有代表性的著作的译本也出了一些。语言研究所办的内部刊物《语言学资料》（1951~1966），共出了32期，在主要介绍苏联语言学家著作的同时，一个时期也转载了相当数量的西方语言学著作，特别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著作，影响较大。

与前一时期比较，我国语言学界可谓空前繁荣，普通语言学领域也大有进步。著作和译作数量多了，质量也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建立促进了整个学术事业的繁荣。语言学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和苏联语言学的影响，促进了我国语言学者的理论研究。由于学习方法的不当和政治上“左”的干扰，出现了一些偏向：一是有些著作满足于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缺乏对语言事实的深入发掘；一是在学习苏联语言学家的著作时，往往以阐释他们的观点代替了独立思考。另一方面，简单化地对待西方语言学，凡西方语言学家，都冠以“资产阶级语言学家”的帽子，对他们的学说则大加讨伐，多是批字当头，吸收为次，我国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在积极参与的同时，自身也经常受到这样的待遇。一时间，“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口号叫得很响（在语言学中运用唯物辩证法与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学”不应混为一谈）。

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正确的批判与继承,延缓了语言学的进步。也有不少语言学者,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此倾向进行了一定的抵制,以多种方式表达了一些合理的意见。

三、进展时期

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语言学包括普通语言学出现了新的局面。

周建人的短文《思维科学初探》(光明日报,1979.6.13)引发了语言与思维(思想)的关系的讨论。讨论集中于思维(思想)是否先于语言,或思维(思想)是否可以脱离语言。这在过去,语言与思维(思想)同时产生、两者不可分离,已成定论。周文却提出了思想先于语言的观点,反响热烈。这场讨论虽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语言学中的禁区,促进我国语言学者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伍铁平将他有关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五篇文章加上一篇报道编成《语言与思维关系新探》(上海教育,1986;增订本,1990)。其后有王维鏞主编《语言与思维》(福建教育,1990)介绍国内外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不同看法,探讨了两者的起源和发展等。

国外语言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成果累累。一批经典性或具有代表性的西方语言学著作的译本陆续问世。计有:[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1980),[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钱晋华校,商务1980)[美]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上册1986,下册1987),[丹麦]叶斯柏森《语法哲学》(何勇等译,王惟苏、韩有毅校,廖序东审订,语文,1989),[法]马丁内《普通语言学纲要》(罗慎仪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法]房德里耶斯《语言》(岑麒祥、叶蜚声译,商务,1992)。其中索氏和布氏的书堪称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多年来人们靠某些文章中引用的片言只语去体会其大意,两书译本到80年代初终于出版,大家得以接触全文。近二三十年西方语言学界曾独领风骚的乔姆斯基几个时期的代表作也先后翻译出版:《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1979),《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黄长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1986),《语言与心理》(朱小华、侯月英译,华夏,1989),《支配和约束论集——比萨学术演讲》(周流溪等译,赵世开校,中国社会科学,1993)等。

语言哲学方面,国内学者的专著有:涂纪亮主编《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人民,1988),讲了指称理论、意义理论、意义检验理论、真理理论、言语行为理论等。涂纪亮《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中国社会科学,1988),褚孝泉《语言哲学:从语言到思想》(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周昌忠《西方现代语言哲学》(上海人民,1992)等。涂纪亮又总结性地写了《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6)。

语言逻辑方面有王维贤等《语言逻辑引论》(湖北教育,1989),介绍和论述比较全面,涉及语言和思想,意义和定义,词项,词句的简单结构、嵌套结构和复合结构,非陈述语句和模糊语句等课题。马佩主编《语言逻辑基础》(河南人民,1987),对比研究各种语言形式与各种思想形式,介绍几门语言逻辑分支(问题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

对国外语言研究情况和成果的综合介绍或评述的专书纷纷出版。其中,徐烈炯《生成语理论》(上海外语教育,1988)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写出的全面介绍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语理论的读本。赵世开主编的《国外语言学概论——流派和代表人物》(北京语言学院,1990),第一部分介绍各主要语言学流派,第二部分介绍90多位有代表性的语言学家。岑麒祥

的《普通语言学人物志》(北京大学, 1989), 汇集了他历年撰写的对索绪尔、梅耶、雅可布逊等 18 位语言学家的评述文章(个别为第一次发表)。徐志民的《欧美语言学简史》(学林, 1990) 吸收了在他讲学期间搜集到的新材料, 洪堡特和索绪尔各有专章评述。汪溶培、顾雅云编译的《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走势》(辽宁教育, 1992) 分三部分: “语言学的面面观” “词汇语义学” 和 “语言学的新探索”。李廷福主编的《国外语言学通观》分 “国外语言学专题” “国外语言学家传” 和 “术语释义” 三部分及几个附录。

语言学者对语言学教材建设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各种概论性的普通教材、电视大学教材、高等自学考试教材相继出版。其中, 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新疆人民, 1981) 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概论新教材, 把语言作为 “符号系统” 与 “交际工具、思维工具” 并提, 有 “句子的生成和转换” 和 “应用语言学” 专章、“语义” 专章。紧随其后的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 1981, 第 3 版 1997) 是这一时期发行量较大使用单位较多的教材之一, 它吸收了近年西方教材和研究中的一些新成果, 如音位的区别特征, 语法的递归性, “变换”, 语言的普遍特征。马学良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华中工学院, 1981, 修订本 1985) 的鲜明特点是尽可能联系国内语言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 并且运用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些新成果。刘伶等主编的《语言学概要》(北京师范大学, 1984, 修订本 1987) 在师范院校影响较大, 在 “总论” 之后分 “结构论” 和 “功能论” 两篇; “语义” 章内容较充实, 除讲义素分析、语义场外, 单有 “句义” 一节; “句法” 章讲到 “句式转换” “下限结构和上限结构”; “语言与思维” 章讲到 “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 “语言与表象思维”。胡明扬《语言与语言学》(湖北教育, 1985) 改变分章节的做法, 共 20 讲, “语言和文学” “诗律学” 各单列一讲, “传统语法”、“习惯语法和现代描写语法” 各为一讲, 关于语言与社会的有 4 讲; 篇幅不大, 涉及面广, “只能对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都介绍一点”(《前言》), 从有限的学时来看, 有较好的适应性。另一部考虑教学的适应性较多的教材是石安石、詹人凤《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 1988), 此书原是作为高校自考教材编写的, 后改为高校普通教材重印, 被认为 “重点突出, 简明扼要, 很便于学生自学。内容方面不仅适当地反映了语言学的新发展, 而且持论公允慎重”(刘叔新, 见 1992 年版《后记》)。伍铁平主编的《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 1993), “语言的构造与机制” 一章最有特色, 其中介绍了预设、排除、补偿、多余、类推、对称、经济等七种机制。邢公畹、仲哲明主编的《语言学概论》(语文, 1992), 是高教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织编写的自考教材。这一时期的教材大多仍是结构与功能(本质)并重, 或更偏前者, 结构部分有的取 “语义” 而舍 “词汇” ——这是现代西方教材的一般做法, 如李、徐本和叶、徐本; 有的 “语义”(或 “词义”) 和 “词汇” 并列, 如刘伶本和石、詹本; 有的仍旧是在 “词汇” 中讲点语义和词义, 如马本和戚雨村主编的《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 1985)。余志鸿、黄国营主编的《语言学概论》(山西高校联合, 1994) 与众不同, 大大压缩了结构部分。有的教材以相当的篇幅分别介绍了一些边缘学科, 如王德春《语言学教程》(山东教育, 1987)。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文字原理》(岳麓书社, 1996), 将语言和文字并提, “更加注重文字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绪论》); 认为语言除交际功能和思想功能外还有文化功能; 再是在语言各部分全面贯彻 “位” 与 “素” 的区别。

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些语言学者理论研究(兼及汉语)的综合性论文集。《方光煮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 1986) 中有首次发表的《试论语言的研究方法(提纲)》《论语言记号

的同一性(提纲))等文;《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语文,1986),收有《语言的信息》《谈谈层次分析法》《句法语义浅谈》等文;《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商务,1990)中《语言与言语问题争论的意见分歧的根源》是首次发表,《美国描写语言学语言分析方法述评》是首次公开发表;《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收有《语言的定义、功能、起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探索》《论语法》《论索绪尔的突破精神》等文。《徐通锵自选集》(河南教育,1993)“开始在汉语的研究基础上提炼、总结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作者简介》),如从文白异读中提出“叠置式音变”,在语法研究中提出“语义句法的结构框架”。赵元任原在台湾出的演讲集《语言问题》也在大陆出版发行(商务,1980)。

语音方面的专著有:王理嘉《音系学基础》(语文,1991),“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介绍现代音系学基础知识的入门书”,“从语音常识入手,讨论音位的方法和北京语音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林焘《序》)。张彦昌等《音位学导论》(吉林大学,1993)“除介绍语音学的一般知识外”,“集中讨论了音位学的一些主要理论”,涉及好几个学派,“重点放在古典音位学和生成音位学上”(《前言》)。

语义方面,贾彦德《语义学导论》(北京大学,1986,后作重大修改,改名为《汉语语义学》,1991),是我国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部语义学专著,讲了语义系统、义素分析法、语义场、义位的组合等问题。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1986),毛茂臣《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学林,1988),伍谦光《语义学导论》(湖南教育,1989,修订本1991)以介绍西方语义学说为主,有各种流派,各种理论,如并置理论、结构语义、语义成分分析、语义场理论等,最后联系到英语教学。徐烈炯《语义学》(语文,1990)上篇介绍各家语义理论,下篇讲语言学领域内语义研究的一些重点课题;该书强调重视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石安石《语义论》(商务,1993)和《语义研究》(文集,语文,1994)。石著“能较好地联系汉语吸收西方语义学的一些精华,讨论语义单位及其组成成分、语义的聚合和组合、歧义、模糊、蕴含、寓义和预设问题。其中以歧义、模糊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说理也较为清楚。”(徐通锵、王洪君,1996)。

词汇(兼及词义)方面,王德春《词汇学研究》(文集,山东教育,1983)由12个单篇组成,内容涉及词汇学和语义学两个领域,分别探讨词、熟语、语义和词典四个方面的问题。刘叔新《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文集,天津人民,1984)收《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词的形象色彩及其功能》《词语的意义和释义》等文。程曾厚《计量词汇学及其他》(文集,江苏教育,1987)。刘叔新《语义学和词汇学新探》(文集,天津人民,1993)收《语义学的对象问题》《论词语的意味》《词语意义间的依赖关系》《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等文。由于70~80年代我国语言学者多人参加了大中型辞书的编纂工作,词典学的研究受到空前重视。除几种译著外,自编专著有:胡明扬等《词典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1982),继而有《辞书研究》编辑部《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文集,上海辞书,1985),黄建华《词典论》(上海辞书,1987),李开《现代词典学教程》(南京大学,1990)。这些著作中有不少中国新辞书编纂工作的经验总结。

语法方面的专著有:徐思益《描写语法学初探》(新疆人民,1981),从对语言的整体认识说到语法,既讲“语言的形式和内容”“语言符号系统”“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又讲“描写语法学的基本方法”“词和词类的划分问题”“句子结构”。胡壮麟、朱永生、张德录《系统

功能语法概论》(湖南教育, 1989), 是对韩礼德学说的阐述。主要介绍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的理论, 也讲它的应用, 并有专章对它与其他语法流派进行比较。同类性质的书还有程琪龙《系统功能语法导论》(汕头大学, 1994)。

语言的模糊性研究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热点。伍铁平的论文《模糊语言初探》(《外国语》1979·4) 拉开了研究的序幕。接着他又发表了《模糊语言再探》(《外国语》1980·5)《论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研究对象与正名问题》(《语文现代化》1984·2)《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百科知识》1984·12) 等系列论文, 到1993年达35篇。苗东升《模糊学导引》(中国人民大学, 1987) 是模糊学的一般理论, 但着重探讨了语言的模糊性问题。孙连仲、高炜《模糊语言学》(陕西人民, 1990) 讲了模糊语言学的缘起、特点, 模糊语言的描述方法, 语言变量的语法规则, 语言值的模糊数据等。不少学者著文探讨了修辞中的模糊性, 蒋有经出了专著《模糊修辞浅说》(光明日报, 1991)。各地学者相继撰文发表研究心得。学者们主要就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一, 何谓模糊, 即模糊的本质问题; 第二, 语言模糊性的根源何在; 第三, 语言模糊性的计量问题。

歧义问题是人们关注的又一热点。朱德熙《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0·2), 探讨了有关歧义的一些原则问题: 歧义的性质、原因以及分化歧义的某些困难; 文中还第一次提出句法歧义的个别实例总是代表一定歧义格式的见解。吕叔湘《歧义类例》(《中国语文》1984·5); 收入《吕叔湘文集》第三卷(商务, 1992)时改题《歧义的形成和消除》, 指出形成歧义有“结构切分不同”“结构关系不同”“多义成分”等多种原因, 消除歧义有“语音”“上文”“下文”“环境”“情理”等五种手段。石安石《说歧义》(《中国语言学报》第三期, 商务) 辨析了歧义的本质、歧义的“同形”、歧义的类型、歧义格式等问题。徐思益在《在一定语境中产生的歧义现象》(《中国语文》1985·5), 探讨了不同于一般学者所理解的语境中的“歧义”现象。响应徐文的有王建华《论语境歧义》(《中国语文》1987·1)。系统分析现代汉语中的歧义现象的专著有吴英才、李裕德《现代汉语的歧义》(宁夏人民, 1983) 和文炼、允贻《歧义问题》(黑龙江人民, 1985)。

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论语言与语言学的重要性》(北京语言学院, 1994) 收入论述此专题的论文和译著。王德春《语言学通论》(江苏教育, 1990) 是一部全面论述语言问题的大书。该书是作者多年科研工作成果的汇集, “在兼顾传统语言学同时, 反映了现代语言学的若干新信息, 涉及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前言》); 此书从语音中分出了音位学, 从词汇中分出了熟语学。陈平《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事》(重庆, 1991) 收10篇文章, 一半是介绍西方现代语言学及其流派的, “能够做到融会贯通”; 一半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和英语的, “也能从新的视觉出发, 使读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吕叔湘《序》)。孙维张主编《语言散论》(吉林教育, 1994) 也是一部大书, 努力用文学笔调谈心式地系统介绍了语言学知识。

关于语言研究方法的专著有梁锦祥《语言学研究的通用方法》(广东科技, 1985) 和方经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河南人民, 1993), 后者声明不谈历时的和宏观的研究方法, 概述一般原则之后, 分别介绍语音、语义、语法和语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跨语言的研究方法。

从以上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我国的普通语言学工作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首先是译介工作加大了广度和速度。它不仅给中国语言学以启发和借鉴, 而且“可以拿来跟本国语言的研究

成果比较……不知彼很难真正知己”(吕叔湘, 1980)。其次, 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大, 而且成果频出。更可喜的是新一代正在成长。可以说有了一个好的势头。任重而道远, 问题还不少。就对国外语言学的学习、借鉴来说, “搜集采购之功多, 提炼转化之功少”(王宗炎, 转引自王福祥、刘润清, 1996)。而国内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提出的不少新现象新问题, 还没有作出相应的理论总结。普通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也少得可怜, 全国性的专门的学术讨论会屈指可数, 曾经造过一点声势的两市一省(北京、上海和广东)的“理论语言学学术讨论会”, 1982~1987年间先后在三地各开了一次就偃旗息鼓。论文和专著数量可谓不少, 但经得起推敲的精品不多; 重复的多, 独创的少; 概论性的多, 提高性的少。有的只是东拼西凑或炒冷饭的急就章; 有的内容单薄却故弄玄虚, 让同行人都望而生畏; 有的借用国外著作的框架和观点, 简单地换上中国语言的例子。更有甚者, 有的成篇成段地引用他人(国内或国外)的著作而不加任何说明; 一些人轻视基础理论的学习, 不愿付出艰苦的劳动, 不做扎扎实实的研究, 却急于“发明”什么原理, “开创”什么新学科。这些做法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自然是有害无益。

《语文研究》(太原) 1998.2

第一章 语 音

一、教学提示

语音一章共有八节。本章主要介绍普通话语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语音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的许多问题和现象都和语音有密切关系。本章的教学目的是，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语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熟练掌握普通话语音系统，增强规范意识，能自觉地运用语音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提高普通话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并为现代汉语其他章节的学习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语音基础知识一节的重点是语音的“四性”。语音的社会属性、物理属性、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对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都有普遍意义。正确认识和理解语音的社会属性，对于语言的学习有重要作用。语音的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关系密切。准确掌握发音器官各部位，是熟练运用发音器官的前提。本节关于语音的生理属性的介绍，应和后边普通话语音的学习融会贯通。语音的学习离不开大脑的“指挥”，重视“语音的心理属性”，对于语音学习有重要意义。熟悉和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也是本节的重点之一。

在普通话语音系统中，普通话声调一节是重点和难点之一。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普通话声调系统区别于任何一种方言。学习声调一节时，应深刻理解“普通话的四个声调是普通话语音最显著和最基本的特征”一句话，充分重视声调和腔调学习，准确熟练地掌握普通话声调的调值。熟练掌握声调对应规律，能运用这些规律，指导自己的普通话学习。

声母、韵母两节，应熟练掌握普通话与自己母语在声母、韵母方面的差异，并能进行方音辨正。

音节一节，重点要掌握普通话音节的“拼合规律”。

音变一节，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普通话的音变形式和音变规律，掌握普通话常用语气词“啊”的音变规律。

韵律特征一节的重点和难点有以下几点：1. 词轻音、词重音和词句中变读的轻重音的规律和区别。2. 停顿、语速的规律及实践。3. 语调和句调的区别和联系。

语音的规范化是本章学习的重要目的之一。要求学生增强规范意识，努力讲用普通话，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